

# 蘇聯與東歐關係之研究

趙春山

## 壹 前 言

- 壹、前面
- 貳、戰後蘇聯對東歐的控制
- 參、東歐共黨政權面臨的挑戰
- 肆、蘇聯與東歐的「整合」途徑
- 伍、結語

戰後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基本上可以從史達林統治時期作為分野。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蘇聯與東歐內部各自發生的改變，影響到雙方關係的型態。在史達林時期，蘇聯與東歐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帝國」和「附庸」的名詞來形容；史達林死後，儘管蘇聯仍舊是支配東歐最具實力的國家，但雙方關係已不再具有「附庸」的性質，「蘇聯與東歐處於談判（negotiation）的狀態，蘇聯以其權力來與東歐談判，但蘇聯必須常常接受妥協。在東歐任何地區，蘇聯都不再具有發號施令的地位。」<sup>①</sup>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蘇聯與東歐關係的演變，分析影響雙方關係演變的各種因素，以及評估蘇聯未來將採何種方法來處理它與東歐國家的新關係。

① 學者歸納東歐附庸與蘇聯的改變包括：(1)經濟制度朝向更為彈性組織的改革，使用刺激經濟及更為考慮消費需求；(2)新專業化中產階級的續增；(3)對知識分子與文化生活的控制，予有限地緩和；(4)與外界接觸增多，特別是與西方世界為然；(5)民族主義的膨脹影響到政府的政策與一般人民的懸念。John C.Campbell, "Eastern Europe: Social Change, Intellectual Restlessness, Political Uncertainty", in David S.Coller, Kurt Glaser,(eds.), Western Policy and Eastern Europe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6), pp. 19-20.

② Stephen S. Anderson, "Soviet Relations with East Europe," Current History, vol. 51, No. 302, October 1966, p. 200.

## 貳 戰後蘇聯對東歐的控制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美國密蘇里（Missouri）州，富爾頓（Fulton）的威斯特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發表演講，談到歐洲的情勢時指出：「從波羅的海（Baltic）的史蒂丁（Stettin），到亞德里亞海（Adriatic）的特里斯特（Trieste），一道鐵幕（Iron Curtain）已穿越大陸降下。在這條線的背後是中歐及東歐古老國家的一些首都。所有這些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伯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及索非亞等名城及其周圍人民，均在蘇聯勢力範圍內。他們不但在各種形式下受到蘇聯影響力的支配，並且受到莫斯科日增的高壓控制。」<sup>③</sup>

戰後蘇聯將東歐國家關進「鐵幕」，可以說是歐洲歷史舞台上的一幕悲劇。實際上，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即着手在東歐實施「蘇維埃化」的準備工作。蘇聯曾在一九四一年，在蘇聯境內訓練「捷克步兵營」，至一九四四年底，完成了一個步兵軍、戰車旅、航空師、砲兵團的訓練工作。一九四三年春，蘇聯在境內編組「波蘭人民軍」，人數多達三萬三千人。同年成立了「羅馬尼亞步兵師」與「保加利亞解放軍」，後者發展成一支為數十一個旅的部隊。一九四四年八月，蘇聯為南斯拉夫訓練軍官，編組「南斯拉夫戰車旅」、「航空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南斯拉夫在蘇聯各軍校受訓的軍官達三千一百二十六人。<sup>④</sup> 在蘇聯控制東歐的準備工作中，蘇聯在東歐各國訓練的特工人員，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九四三年，史達林為了因應戰時國際情勢及加強蘇聯予人放棄世界革命政策的印象，而解散了列寧在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國際」（Comintern）。雖然如此，「第三國際」在蘇聯設立的一些專門學校中，訓練了上千的外國共黨分子，這些特工人員會參加西班牙、希臘及其他地區的內戰；他們也從事各種政治罷工、煽動、及執行間諜任務；他們在各方面幫助蘇聯情報人員，並利用其他國家的大眾傳播促進蘇聯的國內及對外政策。雖然這些大約九十個地區國家共黨的實力很小，但克里姆林宮可以認定，它幾乎在每一個國家都有了可以依賴的支持者。<sup>⑤</sup>

<sup>③</sup>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s Iron Curtain Speech"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ume II,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3), p. 214.

<sup>④</sup> 丘律，「蘇俄戰後之擴張」，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日，頁四十一至四十六。

<sup>⑤</sup> John S. Reshetar, JR., *The Soviet Part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U. S. S. R.*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71), pp. 319-320.

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後，史達林開始在東歐擴張蘇聯的影響力。史達林最初的着眼點是控制東歐可以避免這個地區成為外來侵略蘇聯的捷徑。史達林認為只有在蘇聯邊界附近出現「友好」的東歐國家，才能保障蘇聯本身的安全，而只有共黨控制下的東歐國家政府才是安全與可靠的盟友。在戰後初期的一、兩年，史達林並不急於促使東歐完全赤化，史達林的想法是，經過戰爭的破壞，蘇聯本身需要進行重建工作，同時，蘇聯需要時間來鞏固它在東歐的控制，以及鎮壓東歐內部的潛在反抗聲浪。因此，在這段過渡期間，蘇聯的政策是採取向東歐榨取經濟補償，建立「聯合股份公司」（Mixed-stock Companies）俾便於蘇聯的經濟滲透，以及成立「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ies）政府作為對付當地反對分子的「憲法基礎」<sup>(5)</sup>。

對於蘇聯而言，上述「民主政府」就是共黨政府，而所謂「自由選舉」也就是禁止那些不利於共黨的其他黨派活動的一種「選舉」。戰後初期東歐出現的這些「聯合政府」，在蘇聯駐軍支持下，「聯合政府」的內政部長皆操在共黨手裏，由於內政部長控制警察力量，共黨握有這種決定性的力量後，很容易擴大其支配力及轉變該國的獨立地位<sup>(6)</sup>。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在戰後初期，蘇聯對東歐的政策目標，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這些目標，也是影響蘇聯當時與東歐關係型態的因素：

- (1) 獲取對蘇聯邊境西面地區的影響力，藉之和德國佔領的地區相抗衡；
  - (2) 確保東歐內部不受那些敵視德國而又敵視蘇聯的勢力所控制；
  - (3) 利用東歐作為蘇聯經濟復原的目標；
  - (4) 避免使東歐倒向資本主義世界，使資本主義世界不能利用東歐來對抗蘇聯；
  - (5) 利用東歐作為蘇聯推展革命的一個轉捩點。<sup>(7)</sup>
- 為了達成上述的政策目標，蘇聯利用的工具除了秘密警察以外，最重要的是蘇聯駐在當地的「紅軍」，蘇聯與東歐國家黨與政的接觸，以及對東歐的經濟控制。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蘭舉行的一次會議中，蘇聯成立了「共黨情報局」（Cominform），參加的有九國共黨，包括蘇共、

(5)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wer and Europe, 1945-197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p. 21-22. 為了使東歐附庸對蘇聯卑恭屈膝，史達林強調東歐政府對蘇聯及蘇聯在東歐國家內部的「鐵路部隊」負有橫濱。see, p. 22. 另一方面，史達林將蘇聯的管理與附庸國的第一結合成一個聯合股份公司。如此，可以提供蘇聯剝削附庸國的資源，以及行使生產與分配的合法藉口，而緩和附庸國內部的反對聲浪。see Jan F. Triska, David D. Finley,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211.

(6)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27.

(7)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1), pp. 4-6.

波共、南共、羅共、捷共、匈共、保共、法共及義大利共黨。這個組織雖具有反美的色彩，但基本上是作為蘇聯控制東歐附庸的工具；義共與法共的參加，也意味着蘇聯努力要破壞馬歇爾的歐洲經濟復興計畫。「共黨情報局」在一九四七年會要求南斯拉夫執行批判法共與義共的任務。莫斯科認為這兩個西歐共黨效率太差。「共黨情報局」的總部設在伯爾格萊德，反應出史達林利用此組織控制狄托政權的企圖。「共黨情報局」的功能雖然有限，但它出版的一份報紙——「爲了最後和平，爲了人民民主」（For a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受到蘇共的控制，並被蘇共用來傳遞各國共黨路線的指示。<sup>⑨</sup>

由於南共被控採取「民族主義態度」（nationalistic attitude），蘇聯決定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將南斯拉夫逐出「共黨情報局」。事實證明，狄托不但要對抗蘇聯的控制，並且企圖組成一個共黨巴爾幹聯邦。當蘇聯的控制權力強化後，東歐國家被支持狄托的人，都遭到審判。但不可否認的，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的惡化，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sup>⑩</sup>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Economic Mutual Assistance, CEMA, or COMECON以下簡稱「經互會」），最初的會員國是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東德於次年參加。

根據蘇聯理論家的看法，「經互會」與其他國際經濟機構，以及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機構，在許多方面皆有不同之處。蘇聯學者並舉「經互會」與「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or Common Market）之間的「不同」，加以比較：

- (1) 「經互會」是以成員國的主權平等為基礎，「經互會」作出的決定和建議，都是採所有有關國家一致同意的原則，如果某一個國家對某一合作項目不感興趣，這些決定與建議則不適用這一國家；但在像「歐洲共同市場」這樣的資本主義國際組織，決定往往以一種有條件的多數通過，而非一致通過。如此，則妨礙了會員國的主權，特別是那些小國家為然；
- (2) 「經互會」的所有機構，其代表一律平等，故可確保會員國的平等權力而不論其領土、人口與經濟潛力如何；在「歐洲共同市場」的最高機構「歐市委員會」內，西德、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等主要國家，每一國家擁有一票；盧森堡有一票，其他如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愛爾蘭，則擁兩票。此一安排使主要國家能將其決定，強行加諸於「次要夥伴」；
- (3) 「經互會」一直以平衡發展的原則，以及在符合會員國人民的利益，試圖利用會員國計畫經濟發展的優點的原則，來

<sup>⑨</sup> Reshetar, *op. cit.*, p. 321.

<sup>⑩</sup> *Ibid.*

進行各種活動；歐市的行動則是以利用市場力與利潤動機，僅優先考慮大壟斷資本的利益，作為基礎」。<sup>(2)</sup>

實際上，在史達林統治蘇聯時期，「經互會」並不是一個平等的組織，它的成立，只是作為史達林支配東歐國家對外經濟關係，以及作為對抗「馬歇爾計畫」的工具。「經互會」本身並沒有努力促進東歐國家的經濟改善，「經互會」的每一個成員皆改變傳統與西方貿易的方向，轉為體系內的新貿易途徑。儘管這個組織聲稱會員一律平等，但是史達林的目的是控制東歐成員國，使它們改變戰前的經濟發展形態，轉而幫助蘇聯達到它對資本財的經濟需求。<sup>(3)</sup>

由於「共黨情報局」與「經互會」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工作，主要還是依賴蘇聯與附庸國的雙邊條約，以及蘇聯在當地的駐軍來維持。

從一九四八年開始，蘇聯分別與東歐國家訂立若干條約。這些條約保證，當德國侵略事件再度發生，以及任何國家與德國結

盟時，蘇聯與東歐締約國將「相互幫助」。<sup>(4)</sup>

在維持蘇聯的控制，以及促使東歐國家加速共產主義化最重要的角色仍是蘇聯在當地的「紅軍」。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史達林在一篇演講中，強調歐戰的勝利，證明了「紅軍」的優越，證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與「蘇維埃」國家制度的優越。史達

林表示：

「……我們的勝利首先說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已經獲勝，『蘇維埃』社會制度已成功地經過戰火的考驗，並證明其完美的生存能力。……由於經過戰爭的客觀教訓，已經沒有一個懷疑者會胡亂地表現對『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懷疑，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否生存的問題，而是要證明『蘇維埃』社會制度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具生存能力與更穩定的問題，是要證明『蘇維埃』社會制度是一個比任何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好的社會組織形式。其次，戰爭的結果，顯示出，『蘇維埃』多民族國家制度，不但經過考驗，甚至在戰爭中更為茁壯，證明了它是一個具有完美生存力的國家制度。……目前重要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已證明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模式，它是屬於一個國家組織制度，在此制度中，民族問題與各民族合作問題，比在任何其他多民族國家，更易獲得解決。最後，我們的勝利代表了『蘇維埃』軍隊的勝

(2) M. M. Maksimova, *USSR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p. 106-107.

(3) Triska, *op. cit.*, p. 210; see also Wolfe, *op. cit.*, p. 23.

(4) 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蘇聯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與保加利亞締結「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與匈牙利締約；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與波蘭締約；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與羅馬尼亞締約；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與捷克締約；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與南斯拉夫締約。

V. I. Popov, I. D. Ovsyan, V. P. Nikhamin, *A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 50, 52, 57, 58, 60, 62.

利，證明了我們的『紅軍』業已獲勝，『紅軍』已勝利地通過了戰爭的逆境，徹底擊敗了敵軍，成爲戰後的勝利者。」<sup>⑭</sup>依史達林之見，「蘇維埃」制度較任何資本主義制度爲優，而根據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目標，蘇聯利用德國戰敗歐洲出現的權力真空，强行將這套「蘇維埃」制度在東歐推銷，並運用史達林言下「優越的紅軍」，作爲執行史達林政策的工具。

## 參 東歐共黨政權面臨的挑戰

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的死，爲東歐的政治發展，打開了新的門戶。在這段爲期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東歐政治社會的變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以及外來影響力的衝擊等，皆造成蘇聯與東歐關係的改變。

### 一、社會的變遷

東歐共黨政府的官方敘條形容：戰後東歐社會的社會主義革命已近完成；舊有的上流階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富農等已被清算；在共黨領導下，無產階級引領着社會的轉換，並與農人及新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準備朝向共產主義的無階級社會。<sup>⑮</sup>

實際上，東歐國家內部仍是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所說的「階級」社會，大致而言，可以將這些階級區劃爲下列四種：(1)共黨政客與官僚，加上共黨御用的知識分子與專事奉迎的投機分子；(2)專業人員、經理、技術人員、從事經濟企劃人員及至少帶有「次獨立」(semi-independence)的知識分子；(3)工業化的工人階級，這種階級的人數日增，但在物質報酬與政治影響方面所獲很小；(4)集體化的農民（波蘭除外），仍舊遭到剝削。<sup>⑯</sup>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他們與共黨政權的關係，都是影響東歐政治與社會

⑭ "Election Speech by Premier Stain On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Postwar World," quoted in Schlesinger,(ed.), vol.2.*op.cit.*, pp. 193-194.

⑮ Campbell, *op. cit.*, p. 20.

⑯ 對於東歐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特別是知識精英分子在社會扮演的角色問題，基本上存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爲此一趨向難以阻止，並將使東歐國家的民族獨立與人民的獲取更多政治自由；另外一種看法是，東歐共黨與蘇聯合作下，可以控制這種不利的變遷，使之不會危及共黨統治權力與蘇聯的主要利益。有些人甚至懷疑，這些變遷是共黨政府有計劃實施或是加以鼓勵的，目的是爲了欺騙西方，爲了使共黨戰略更加彈性，以及消除那些反對共黨統治的潛在勢力。

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東歐國家內部，民族主義的衝擊，也是一個影響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從南斯拉夫被逐出「共黨情報局」後，所謂「民族共產主義」（最初稱為「狄托主義」）便應運而生。儘管蘇聯力圖將此「異端邪說」從東歐除去，但民族主義已在東歐其他國家復活。最重要的是，東歐新生的二代已逐漸走向權力中心，這批年青人雖為共產黨員，但却未曾經歷過蘇聯指示下獲取權力的痛苦經驗，他們的經驗主要來自其國家，以及他們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在這些年青人即將當權的情況下，由於東歐國家之步入現代技術時期，而出現技術專家的競爭現象，故年青的共黨領袖受到共黨意識形態及蘇聯的影響較小。此外，從敞開的西方之窗，東歐年青一代可以比較東西方之間經濟、技術與管理各方面的優劣點，他們自然有所選擇。<sup>⑤</sup>

在談到東歐民族主義的問題時，學者認為，在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仇恨俄羅斯人的歷史遺產，乃是當地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仇俄心理，影響到民眾一般對共產制度的態度，因為當地的共產政權，乃是「在紅軍的刺刀尖下」（on the tips of Red Army bayonets）產生的。這種態度嚴重地損害到共黨領袖建立政治權威的企圖。在波蘭與羅馬尼亞等一些東歐國家，長期的民族追憶（national memory），孕育了領土遭蘇聯侵佔的憤怒感覺，此一感覺目前仍普遍存在，並且有增無減；羅馬尼亞領袖試圖同化境內少數民族，也加強了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在保加利亞與捷克，情況比較不同，這兩個國家過去與俄羅斯人具有共同的斯拉夫文化，及患難與共的命運，故歷史上即有特殊的友誼關係。上述的因素，可以從兩國人民的態度，及對「蘇維埃」角色的認知方面，反應出來。但在捷克，這種對鄰境俄羅斯人存在的「友誼」與「理性」的幻想，却因一九四八年史達林的鎮壓而發生動搖，最後更因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而轉變成仇恨的心理。捷克境內「斯洛伐克民族主義」（Slovak nationalism）產生的壓力，也是造成一九六八年事件的一個原因。但在保加利亞，親蘇的情緒仍然存在。<sup>⑥</sup>

東德在民族主義的觀點方面，表現的相當分歧與含混。普魯士人的傳統，留下的印象是有時視俄羅斯人為敵，有時視其為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在德國為期四年的佔領，以及蘇聯戰後之駐軍東德，却在東德人民心中產生了敵意；另一方面，東德執政的「社會聯合黨」（socialist unity party）也利用過去德國人對蘇聯的盟友印象（imagine），製造新的東德民族主義。東

⑤ I. F. Brown,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George Schöpflin,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p. 238-239.東歐共黨統治新舊民族主義為鞏固其獨裁統治的工具，在匈牙利羅共領袖米歇爾·尼古拉·尼古拉耶·齊亞塞西(Nicolae Ceausescu)獲得相當成功，參見 Alexander Bregman, "The U.S.S.R and East Europe", in Zbigniew K. Brzezinski, (ed.), *Diommas of Chang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21.

⑥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Eastern European Communism in The Seventies", in Morton A. Kaplan, (ed.), *The Many Faces of Commun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p. 197-198.

德企圖將此「新民族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融合的一個部分，因為東德共黨政權需要蘇聯的支持，同時也可抗拒西德對東德人民具有的吸引力。<sup>⑯</sup>

政治文化的因素，也可用來解釋東歐共黨建立權威的成功或失敗，以及解釋對共黨政策的壓力反對具有的性質。在東歐，只有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與俄羅斯一樣具有相同的拜占庭（Byzantine）傳統，雖然各國發展的方向不一。保加利亞的農民有某些「自治」的傳統，而羅馬尼亞過去的統治者則必須與三個歷史性的公國競爭。其他東歐國家人民則因站在西方的文化線上，他們參與西歐文化，具有羅馬天主教、文藝復興與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傳統，故發展成極度傳統的社會結構與市場經濟的因素。這些都與共黨專權的壟斷制度不相調和。<sup>⑰</sup>

## 二 經濟改革的需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屬於「經互會」的東歐及中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採取的是蘇聯的「非市場模式」（nonmarket model）。這種類型並非它們的本意。韓戰發生後，蘇聯為了備戰，迫使東歐國家修改其長程經濟計畫。韓戰以後，東歐國家民族經濟的復原遂具有兩項特點：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五年，這些共黨國家的和平經濟計畫已經中斷，並再度披上戰爭經濟的外衣。這個時候的經濟，乃是一種史達林式的高度集中化的非市場經濟模式；其次，追隨蘇維埃類型的統制經濟制度（Command Economic System），這些國家也採取明顯史達林式的政治統治制度。<sup>⑱</sup>

所謂統制經濟制度，即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描述而由社會主義國家在二十世紀應用的工業化模式。社會主義國家運用這種模式的基本原則，但同時又放棄生產工具的私有及廢除自動調節的市場結構。這些國家希望因此而避免上述工業化模式的消極後果。因此，它們創立的制度即為統制經濟制度。在東歐，有的稱它為中央制度（centralist system），指導制度（directive system）行政制度（administrative system）或是非市場制度（nonmarket system）。<sup>⑲</sup>

這種統制經濟之缺乏效力，我們可以從蘇聯與東歐在「資本產出比率」的成長表（附表一）中獲知。比較一九五〇至一九六

<sup>⑯</sup> Ibid., p. 198.

<sup>⑰</sup> Ibid., pp. 198-199.

<sup>⑱</sup> Radoslav Selucky,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New York: Publishers, 1972), p. 25.

<sup>⑲</sup> Ibid., p. 9.

(附表一)

| 國別<br>年代 | 蘇聯   | 保加利亞 | 捷克    | 東德   | 匈牙利  | 波蘭   |
|----------|------|------|-------|------|------|------|
| 1950-55  | 1.77 | 1.86 | 2.61  | 1.28 | 4.04 | 2.75 |
| 1955-60  | 2.53 | 1.92 | 3.14  | 2.70 | 2.84 | 3.68 |
| 1960-65  | 3.83 | 3.89 | 14.28 | 6.02 | 3.65 | 4.62 |

資料來源：Radoslav Selucky,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3.

五年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加，可以了解「經互會」成員國必須改革的程度如何。如表中所示，捷克在六〇年代初期的「資本產出比率」的成長最快，立即造成一九六三年國民所得的下降（與一九六二年比較約下降百分之三），並在一九六四年呈停滯狀態。捷克的情況，引起國內對其經濟計畫管理制度的檢討，捷克的例子，可以應用到所有蘇維埃型統制經濟制度的國家<sup>②</sup>。

史達林死後，東歐國家即按照本身的特殊環境，發展適合自己的經濟型態。科技的高度發展，原有的統制計畫經濟已不能適應市場力發展的需要，以及有效的管理，因此，共黨政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採取有效的辦法來改善人民對生活水準低落的不滿，而又能維持共黨在統制經濟制度下的決策權力。

另一方面，東歐國家的經濟趨向發展的同時，它們遂強調政府間的協定必須以雙方利益的原則為基礎。蘇聯領袖希望透過「經互會」以建立「社會主義國際分工」，但卻遭到來自羅馬尼亞及波蘭的強烈反對；這些東歐國家害怕此種經濟融合，會妨礙它們的自主需求，而使它們陷於蘇聯的控制之下<sup>③</sup>。

### 三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

南斯拉夫被逐出「共黨情報局」後，學者認為狄托的所作所為，有若干事項將為南斯拉夫人民及其他所追憶：諸如狄托的市場社會主義，工人的自我管理，南斯拉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自主立場，邊界開放政策（open-borders policy）以及不結盟政策等<sup>④</sup>。而狄托的這些政策，並為南斯拉夫獲取了一些國家利益。由於南國地處蘇聯

② *Ibid.*, pp. 3-4.

③ 蘇聯與東歐國家在經互會中的爭論，參考 Anderson, *op. cit.*, p. 205. See also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Policy in Europe", *Current History*, vol. 73, No. 430, October 1977, p. 106.

④ William Zimmerman, "The Tito Legacy and Yugoslavia's Futur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 May-June 1977, p. 33.

附庸國包圍的巴爾幹地區，狄托不結盟政策帶來的內政與外交利益，必為東歐共黨國家人民所羨慕。<sup>②</sup>

中共與蘇聯的爭執，亦對東歐國家形成衝擊。這兩個共黨政權的分歧究竟始於何時，按照中共的說法：「蘇共中央公開散布一種說法，似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以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而引起，具體地說，這是—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二十次大會是蘇共領導走向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sup>③</sup>

無論中共與蘇聯的爭執是否歸因於中共所說的「三個原則性的分歧」，<sup>④</sup>雙方的分裂因為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魯雪夫片面地將阿爾巴尼亞逐出共黨世界而加強；而羅馬尼亞更利用中蘇共的爭執，在共黨世界內部採取「中立」的立場，並不顧蘇聯的警告，堅持本身有權加速不同的工業發展道路。<sup>⑤</sup>

中蘇共衝突使得東歐國家對蘇共在共黨世界的「一元化」領導產生懷疑。而中蘇共衝突擴大後，雙方的鬭爭箭頭更指向東歐。<sup>⑥</sup>中共在東歐爭取與國的具體實例是，中共「總理」華國鋒於一九七八年八月的訪問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sup>⑦</sup>

中共對外政策愈趨積極，提供羅馬尼亞一個增加活動餘地的機會，以及給與羅國與蘇聯之間關係一個新的分裂理由。羅馬尼亞總統希奧塞古曾向來訪的華國鋒，顯示蘇聯在東歐權力的限度。<sup>⑧</sup>

② 魯賓斯坦（Alvin Rubinstein）更巧妙地形容狄托的不結盟政策是第一個「真正的民族對外政策」（truly national foreign Policy），這個政策使南

斯拉夫與狄托本人獲取眾多的國際聲望與地位，轉而有助於內政的利益。這個政策促成南國國內各種團體的廣泛結合，是南斯拉夫共黨內部各派系所能接受的唯一對外政策，也是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及民間主要階層所能接受的唯一對外政策。Alvin Z. Rubinstein, *Yugoslavia and The Non-Aligne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2. quoted in *Ibid.*, p. 47.

③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北平，一九六五年，頁六三—六四。

④ 中共歸納與蘇聯關係的三個原則分歧為：(1)為了爭取實現和平共處，要不要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進行鬭爭？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鬭爭。(2)和平共處能不能作爲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3)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能不能作爲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能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見「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前引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三〇〇—三〇六。

⑤ Reshetar, *op. cit.*, p. 322.

⑥ 有關中共與蘇聯在東歐的鬭爭背景，參考尹慶耀，「中共、蘇聯在東歐的鬭爭」，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十日，頁十七—二十六。

⑦ 阿爾巴尼亞論及華國鋒東歐之行時，認為他的目的是企圖利用巴爾幹地區作爲火藥筒，挑起一場新的戰爭。見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1978.

阿爾巴尼亞本爲中共在東歐的一個「親密盟友」，史達林死後，雙方更聯合反蘇。一九七七年中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並發展與美國關係後，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公開分裂。一九七八年，中共斷絕對阿經濟援助。參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0, 1978.

⑧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 1978.

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的發展，對東歐國家亦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影響的層面包括東歐的內政，以及整個蘇聯與東歐的集團關係。自從西歐共黨一九七六年東柏林會後，歐共主義者與東歐國家內的改革分子與不滿分子之間，即互通聲氣。一些東歐國家不滿分子的代表，自認為是歐共主義者，他們要求西歐共黨提供道義與政治上的支持；而西歐共黨則希望歐共主義能作為東歐的「借鏡」，幫助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並成為東歐人權團體的盟友。義共與法共領袖，為了抗議東歐及蘇聯違反赫爾辛基協定及東柏林會議最後文件，開始參加一些要求蘇聯與捷克釋放政治犯與不滿分子的集會。西歐共黨擴大對捷克「七七憲章」（Charter 77）簽署者的外交與財政支持。西歐共黨也支持那些參加一九七六年六月波蘭食物暴動與罷工而被囚禁的工人，並支持波蘭的「工人防衛委員會」（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西歐共黨並抗議東德取消不滿分子比爾曼（Wolf Biermann）公民資格的行動，及支持比爾曼的遭受侵害的朋友哈傑克（Robert Havemann）。歐共主義者的行動顯然在東歐境內造成了影響，捷克前外交部長，也是「七七憲章」的簽署人之一哈傑克（Jiri Hajek），形容歐共主義在他與捷克政府的談判中，扮演了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角色，哈傑克說：

「很明顯的，歐共主義者是我與政府談判中的王牌，我問政府當局：你真的認為「七七憲章」是反社會主義的？那麼，支持我們的那些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共黨報紙的文章，算是什麼？難道他們也是反社會主義者？你所說的是反社會主義政黨嗎？」<sup>③</sup>

東歐對於歐共主義的介入，一般的反應有兩種：東歐共黨領袖對於近在咫尺的歐共主義模式，不能置之不理。若干東歐領袖或許認為，義大利共黨透過「歷史性妥協」（Historic Compromise）打開參政之門的辦法，可以用來改善東歐經濟情況的借鏡。但到目前為止，似乎只有匈牙利對國內改革的需要採積極態度，波蘭則持某種程度的積極，羅馬尼亞在外交上是歐共主義者，其他東歐政權對民主化表現程度不一的敵視與憂慮。在近期內，這些東歐國家仍將繼續鎮壓反對人士，並向莫斯科尋求政治與意識形態

共主義嚴加抨擊的行動上。<sup>④</sup>

③ Jiri Valenta, "Eurocommunism and Easter Europ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i, March-April 1978, pp. 47-49.

④ Ibid., p. 49.

方面的支持。<sup>⑤</sup>

東歐共黨領袖對歐共主義的憂慮，乃是基於維持本身政權穩固的考慮，在這方面，他們與克里姆林宮具有一致的利益，但在對蘇聯的關係方面，「歐共主義是所有東歐政治領袖對抗蘇聯霸權的潛在盟友。」<sup>⑥</sup>

#### 四、東西方的「和解」

西方國家與蘇聯及東歐共黨政權「和解」的目的之一，即是企圖打開鐵幕之門。西方並不急於要東歐立即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但希望自由空氣的滲進鐵幕，能促成共黨政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

早在艾森豪執政時，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譴責「圍堵政策」是「消極、無益與不道德的」。杜勒斯強調，美國的對外政策不能永遠與共黨的威脅共存；美國應消除這種威脅。美國應採壓低蘇聯權力的政策；美國應宣稱為自由而戰，並宣布不與蘇聯從事任何足以認可蘇聯對外國人民暴政的交易。這樣的宣告，將維護附庸國人民的勇氣和希望，使他們不會接納蘇聯政權。杜勒斯強調，美國應昭告世人，表示希望及期待解放的發生，這樣一個充滿希望與期待的聲明，將激勵被奴役人民的心情，而加重奴役者的負擔，創造一個解放的新社會。<sup>⑦</sup>美國這種企圖打開東歐鐵幕的「架橋」政策，在甘迺廸（John F. Kennedy）和詹森（Lyndon B. Johnson）時代，更公開地表現出來。<sup>⑧</sup>到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執政時，與東歐國家人民增加接觸，更是他的政策目標。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在一篇名為「從衝突世紀轉向談判世紀」（Moving from an Era of Confrontation to an Era of Negotiation）的演講中強調：

「讓我們趨向一個開放的世界——一個門戶開放、內心開放、精神開放的世界；一個觀念與人民交往公開，以及達到人類精

<sup>⑤</sup> Pavel Machala, "Eastern Europe, Euro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s of Detente", in Kaplan, (ed.), *op. cit.*, p. 252. 臨共主義者在捷克、波蘭與東德的影響力最大，因牠三國具有與西歐類似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參見 Valenta, *op. cit.*, p. 50.

<sup>⑥</sup> Pavel Machala, *Ibid.*, p. 253.

<sup>⑦</sup>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102.

<sup>⑧</sup> *Ibid.*, p. 270. 詹森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一十日敘述美國對外政策與蘇聯的一篇演講中表示：「在共黨國家，我們是站在那些試圖擴大與我們討論各項問題的人那一邊。」這兩個人繼續與我們對話，共產主義將處在一種改變的狀態，這是好指標。」Se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 II,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3), p. 765.

神公開的世界；一個公開尋求眞理，而不管舊有教條與主義何去何從的世界；一個公開伸張正義與理性，以及向真正和平成就開放的世界，此一和平乃存在於各地人民心中，而為其雀躍希望的。」<sup>⑨</sup>

美國對東歐國家進行的和平戰略，在東歐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美國與東歐的貿易顯著地增加，東歐的反美氣氛亦逐漸沖淡。一九七五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onference）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高峰會前夕，美國總統福特於七月二十八日訪問波蘭，隨後並至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訪問，西方觀察家認為，福特似乎要向東歐及蘇聯顯示，美國已不再坐視東歐為蘇聯專有的資產。<sup>⑩</sup>

除了美國以外，西歐從六〇年代開始，亦積極進行與東歐的接觸。法國戴高樂設計的「從大西洋到烏拉山」（From the Atlantic to Urals）的歐洲國家體系，「不但要排除美國在西歐的直接影響力，同時蘇聯軍隊也應自東歐撤走。戴高樂認為，蘇聯應同意其附庸國走向自由化與國家自主的道路」。<sup>⑪</sup>

戴高樂期望將歐洲建立成一個法國領導下的第三勢力，與美、蘇相抗衡。在戴高樂的歐洲國家體系下，東歐是一個組成部分。法國為打破兩大集團而擴大與東歐國家的接觸，實為促進六〇年代中期東西和解政治發展的前奏。有的學者認為，在許多方面，「戴高樂主義者的倡議，為西德『大聯盟』（Grand Coalition）政府一九六七年開始的東進政策，及詹森總統的架橋政策，從事鋪路的工作。」<sup>⑫</sup>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凱辛格（Kurt Kiesinger）和布蘭德（Willy Brandt）領導的「大聯盟」政府，其對外政策的重點之一即是強調與東歐的關係。<sup>⑬</sup>「大聯盟」政府對邊界問題採取比較彈性的立場。西德認為這個問題雖需待歐洲和平之日來臨後才能解決，但卻暗示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不再有效，並表示充分了解波蘭對於尋求「安全邊界」的期望。聯盟政府中社會民主黨（SPD）籍的官員私下態度更具彈性。例如，在該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大會中，布蘭德曾呼籲，承認並尊重奧德—納瑟線（Oder-Neisse Line）為戰後歐洲的現實。據說布蘭德私下曾允諾杜比克（Dubeek）政府，慕尼黑協

<sup>⑨</sup> Ibid., p. 830.

<sup>⑩</sup> U. N.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22, 1973, pp. 53-54;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4, 1975, p. 14.

<sup>⑪</sup> Wilfrid L. Kohl, "France and European Security: de Gaulle and After", in William T. R. Fox and Warner R. Schilling (eds.),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Atlantic Syst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1.

<sup>⑫</sup> Ibid., p. 134.

<sup>⑬</sup> Catherine M. Kelleher and Donald J. Puchala, "Germany, European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in Fox and Schilling (eds.), Ibid., p. 160.

定自始即應廢棄。<sup>⑭</sup>

一九六九年十月，布蘭德出任西德新政府總理後，開始加速推動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關係。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布蘭德訪莫斯科時，與蘇聯簽訂了「放棄使用武力條約」(Treaty on Renunciation of Force)，隨後，並於同年十二月七日與華沙簽約，恢復正常關係；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與東德締約建立關係。<sup>⑮</sup>

上述這些內外衝擊加諸東歐共黨政權的壓力是可以想見的。如果共黨領袖視而不見，或是應付不得法，將形成政治發展上的一些危機。<sup>⑯</sup>因此，為了維持政權的存在，為了建立真正的政治權威及有效的運作，東歐共黨採取三種革新的措施：在政治方面儘量減少民衆的疏離感及衝突的可能性；在經濟方面，針對原來制度的無能，而將擴大成長(extensive growth)型態，轉變為密集成長(intensive growth)型態，在對外政策方面，則要加強國家的自主。<sup>⑰</sup>

## 肆 蘇聯與東歐的「整合」途徑

史達林死後，蘇聯共黨改變史達林過去對東歐的高壓政策，而採行一種「說服」(persuasion)的方式，蘇聯允許東歐共黨有較大的自主權力；蘇聯撤出在東歐國家的一些顧問，並將對東歐的一個直接監督制度，改為相互的磋商。<sup>⑱</sup>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和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雖然令人懷疑史達林的高壓統治方式已再度來臨。但基本上，從赫魯雪夫一直到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克里姆林宮所期望的是建立一個在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羣體」，或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協」。蘇聯此

<sup>⑭</sup> *Ibid.*, p. 165.

<sup>⑮</sup> 德蘇條約內容參考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hereafter cited K. C. A.), August 22-29, 1970, p. 24144. .. 德波條約參考 K. C. A., p. 24345；西德與東德互補條約經過跟 K. C. A.; pp. 25621-25622.

<sup>⑯</sup> 如自我認同的危機，正統合法的危機，政治參與的危機，政策貫徹的危機與資源管理和分配的危機。這方面在討論參考 Lucian W. Pye, Leonard Binder, James S. Coleman, Joseph Lapalombara, Sidney Verba, Myron Wein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1).

<sup>⑰</sup>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op. cit.*, pp. 209. 所謂擴大成長，其特點為擴大資本與勞力，這是標準的工業化類型；而密集成長，則屬工業化後的發展，這種類型的特點是：更有效的利用資本與勞力，應用進步的科技與高水準的工人，更好的組織來從事生產與交易工作。「經互會」成員的經濟具有擴大成長的性質，不能充分地使用自然力。參看 Selucky, *op. cit.*, p. 4.

一政策的改變，乃是基於主觀與客觀環境的需要，而蘇聯整合的努力，則是透過下列途徑進行：

### 一、意識形態的聯繫

赫魯雪夫上臺以後，即強調以馬列主義作為蘇聯與東歐之間聯繫的準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宣言」中，有下列幾段話：

「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各國之間以及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相互關係的基礎，是為生活所考驗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

「社會主義各國把相互關係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國家獨立和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這些原則是很重要的，但是還沒有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全部實質。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們的相互關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互相援助有力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

「社會主義各國間關係中的所有問題，完全可以在嚴格遵守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加以解決。」<sup>④9</sup>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個共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團，參加了蘇聯慶祝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會議，會議「聲明」中涉及蘇聯與東歐關係方面，曾有下列兩段話：

「社會主義陣營是由緊密的社會主義國際團結以及共同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所聯合起來的，沿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前進的、自由而享有主權的各國人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結合。嚴格遵守馬克斯列寧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不可破壞的準則。」<sup>⑤0</sup>

「在所有馬克斯列寧主義兄弟黨之間的關係中，相互援助和支持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原則的實際運用。」<sup>⑤1</sup>

上述兩項文件曾提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這兩個概念。就蘇聯理論家而言，這兩個概念具有不同的意義。因為，「在社會主義體系未形成之前，僅有蘇聯一國實行共產極權專政的時候，『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莫斯科統御並協調各國共黨『隊伍』之組織與行動的準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若干國家共黨在蘇聯直接策應或間接運用下，相繼各在其本國

<sup>④9</sup>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二日，頁二。

<sup>⑤0</sup> 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六日，頁二一四。

獲得共產專政地位。因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產生了，並具備了新的內容和新的性質，乃一變而為『社會主義國際主義。』<sup>⑤</sup>

由此觀之，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乃泛指各國共黨間的一般關係，涵蓋的範圍較廣；「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則適用於那些已在本國取得政權地位的各國共黨與蘇聯之間的關係，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應屬此一類型。

為了緩和東歐共黨的獨立傾向，以及避免使其他國家共黨產生蘇聯獨霸共產主義運動的印象，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東柏林召開的歐洲共黨會議，刪除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個字眼，但蘇聯並不放棄其控制東歐的意圖。

## 二、黨政接觸

蘇聯並不認為它與東歐之間的關係，有黨與政的區別。<sup>⑥</sup>

一九五六年共黨情報局的解散，代表蘇聯在東歐霸權地位的告一段落，從五〇年代末期開始，到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蘇聯即利用不同的工具，企圖表現其對他國共黨的領導權力：包括蘇共中央委員會與其他國家共黨打交道的部門，這些部門皆有蘇共高級人員主管。蘇共領袖也前往許多國家參加該國舉行的共黨大會，而其他國家共黨亦派遣沒有投票權的代表，參加莫斯科舉行的蘇共大會。蘇聯共黨利用這些接觸，進行說服的工作。此外，蘇共除了分發官方出版品及各種秘密指示到各國共黨外，為了促進其影響力，蘇共也發行了一些外文的共黨理論刊物；蘇聯派駐各國的使館、代表團、記者及特務，也負責提供當地共黨情報及各項援助。<sup>⑦</sup>

蘇聯與東歐共黨領袖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每年七月和八月，利用三個星期時間，在克里米亞(Crimea)的奧蘭達(Oreanda)舉行會談。這類會談的詳細內容皆未公布，但從以後的行動顯示，許多計畫事先早已擬妥，或是達成某種默契。<sup>⑧</sup>

⑤ 奧·輔·庫西寧編著，馬列主義原理，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出版。引自蘇俄及其附庸，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五十六年五月，頁一八一。

⑥ Richard F. Staar, "Soviet Relations with East Europe", *Current History*, vol. 74, No. 436, April 1978, p. 148.

⑦ Rishetar, *op. cit.*, pp. 323-324. 在莫斯科舉行，或是在東歐國家首都舉行的這類共黨大會，是蘇聯與東歐之間的溝通媒介。就一九六六年三月召開的第一至十三屆蘇共大會為例，會中即對華沙公約(Warsaw Pact)與中國蘇關係進行討論。蘇聯方面希望利用「共黨大會」，在蘇聯與東歐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政策路線，結果未能成功。主要因為這類會議只是臨時性質，沒有正式的組織作為決策的場所。東歐國家似乎樂於維持這種狀況，如此可以緩和蘇聯對其加諸的約束。Anderson, *op. cit.*, p. 201.

⑧ Staar, *op. cit.*, p. 146. 蘇聯學者透露，會談的重點在各國共黨的行動，促進合作關係及協調對世界局勢的行動。參考N.I. Lebedev, *A New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8), p. 40.

爲了加強蘇聯與東歐國家的關係，赫魯雪夫及布里茲涅夫等蘇聯領袖，亦強化了史達林時期與東歐附庸政府訂立的一些條約。

蘇聯認爲它與社會主義國家訂立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是協助建立雙邊關係的一個主要因素。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蘇聯曾與保加利亞、捷克、東德、匈牙利、波蘭與羅馬尼亞等先後簽署或修訂了若干條約。在蘇共二十三屆大會中克里姆林宮領導階層對這些條約予以很高的評價，認爲它們是「友誼的真正憑藉，使多年累積的經驗、兄弟人民關係的成熟與溫暖，以及他們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得以具體化。這些條約對於我們的共同革命目標有卓越貢獻，並將繼續有所貢獻。」<sup>⑤</sup>

總之，由於共黨的專制與獨裁，在說明東歐與蘇聯的黨政關係時，黨的聯繫必須加以強調。蘇聯理論家亦認爲：「黨之間的協調合作特別重要，它在安排兄弟國家間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與文化聯繫而成爲一個整體的過程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與加強執政馬列政黨在建立新社會過程中的指導角色，相互配合。」<sup>⑥</sup>

### 三、經互會的功能

「經互會」最初只是史達林的一個御用的工具，赫魯雪夫上臺以後，希望透過「經互會」來促使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聯繫。

爲了達到經濟上的整合，赫魯雪夫希望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際分工」（Socialist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赫氏在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一篇演講中表示：「社會主義的國際分工，以及產品的普遍專業化和協調，可以提供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經濟，最爲有利發展的最多機會；各國經濟的相互補充，最後將逐漸合成一個單一『流線型』（streamlined）的經濟整體，在此整體中，每個個體皆有其地位和功能，每個國家和人民都將擁有一個更強大的基礎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任務。」<sup>⑦</sup>赫魯雪夫的理想是使東歐每一個國家生產專業化，以提高「經互會」的經濟效率，並降低成本。同時，各國生產專業化也有利於蘇

<sup>④</sup> Popov and Ovsyany, (eds.), *op. cit.*, p. 49.

<sup>⑤</sup> B. N. Ladygin, O. K. Rybakov, V. I. Sedov,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at a New Stag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 37.

<sup>⑥</sup> N. S. Khrushchev, *Visal Qu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World Syste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62), pp. 12-20. Quoted in Nish Jamgotch, JR., *Soviet-European Dialogu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New Type?*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8), p. 72.

聯的統一運用。

「經互會」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始定期舉行大會。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之第十二次大會，通過該委員會的憲章、規約和組織體系，並詳細說明了「經互會」的職能。一九六二年「經互會」召開大會時，批准了「國際社會主義分工基本原則」(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Division of Labour)，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大會中，各國對「經互會」長期合作的基本方向，獲得協議；一九七一年七月召開的二十五次大會，與會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整合及擴大合作，通過了一項「廣泛綱領」(Comprehensive Programme)。<sup>⑤3</sup>

由於「廣泛綱領」的制定，蘇聯與「經互會」的關係在一九七〇年以後更為加強。蘇聯理論家認為，在七〇年代開始，「經互會」成員已從個別的整合，進入一個發展的、計畫的社會主義經濟整體過程，意即到了「經濟事務國際化」歷史時期的一個最高形式。而上述過程的內容則包含在「擴大綱領」中。對蘇聯而言

，「綱領」對經濟整合下的定義是：

「經濟整合是社會主義分工的一個過程，它集中成員國的經濟，給與它們一個現代的，高度效率的結構，逐漸地集中並提高成員國的經濟發展，在經濟與科技的主要部門之間形成一個全面而穩定的關係，擴大並鞏固成員國的國際市場，改良商品與錢幣之間關係，有意識並有系統地受到共黨、工人黨及政府的控制。」<sup>⑤4</sup>

在維繫東歐對蘇聯向心力方面，「經互會」的功能不能否認。蘇聯一直強調它在「經互會」中的特別地位，認為在實施雙方合作的計畫中，蘇聯扮演特殊角色，因為蘇聯擁有一個「有力的科學、技術、及工業潛力及廣大的物資資源，它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努力解決燃料、能源及原料物質問題時，作出最大的貢獻。」<sup>⑤5</sup>

(附表二) 東歐對蘇聯原料物質的依賴

| 國別   | 百分比  | 物品 | 原油及石油產品 | 焦炭礦 | 鐵礦  |
|------|------|----|---------|-----|-----|
| 保加利亞 | 100% |    |         | 95% | 85% |
| 捷克   | 92   |    |         | 20  | 75  |
| 東德   | 89   |    |         | 60  | 80  |
| 匈牙利  | 88   |    |         | 50  | 77  |
| 波蘭   | 90   |    |         | 0   | 60  |
| 羅馬尼亞 | 0    |    |         | 60  | 60  |

資料來源：

Pavel Machala, "Eastern Europe, Euro-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s of Détente," in Morton A Kaplan, (ed.), *The Many Faces of Commun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 255.

<sup>⑤3</sup> Popov and Ovsyany, (eds.), p.81.

<sup>⑤4</sup> B. N. Ladygin, O. K. Rybakov, V. I. Sedov, *op. cit.*, p. 34.

<sup>⑤5</sup> Maksimova, *op. cit.*, p. 125.

透過這種依賴關係，蘇聯可以勒索政治上的報償。<sup>⑤</sup>

#### 四、華約組織的軍事與政治意義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和捷克，在華沙簽署「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The Warsaw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或簡稱華約（Warsaw Pact），並因此組成「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或簡稱「華約組織」（WTO）。根據條約規定，「華約組織」成立了「聯合指揮部」（Unified Command）<sup>⑥</sup>及「政治協商委員會」（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mmittee），並由「政治協商委員會」必要時成立一些輔助機構。「華約組織」表面上是針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北約組織」（NATO）以及西德的再武裝威脅而成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曾提出一個包括德國中立及永久分裂的歐洲安全體系的建議，遭到西方國家的拒絕。西方反而邀請西德加入「西歐聯盟」（West European Union），並計劃讓西德加入「北約組織」。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一項東歐會議威脅說：如果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簽署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如獲西方簽字國批准，則蘇聯與東歐將成立聯合軍事組織以茲對抗。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西方批准了「巴黎協定」，同年五月九日，西德加入「北約組織」，而蘇聯與東歐遂在同年五月十四日，成立「華約組織」。<sup>⑦</sup>

「華約組織」對蘇聯具有重要的意義，史達林死後，蘇聯領袖爲了控制東歐及中歐地區，成立一個像「華約」這樣的組織，實有其必要。從政治方面看，蘇聯可以利用此組織來傳遞克里姆林宮子東歐盟友的指示；另一方面，透過此組織可使蘇聯獲得東歐國家對其外交政策的支持。依據條約的規定，「華約組織」表面上是採取協商的方式，東歐國家可以表達他們的觀點。如此則避免使人覺得蘇聯居於支配的地位。<sup>⑧</sup>

⑤ 蘇聯過去以世界油價的百分之七十，賣石油給東歐。但原拉伯石油禁運前的油價計算方法已被排除，蘇聯的石油價格到一九七八年時，每年都漲。因此，東歐向蘇聯買的石油，已超出石油输出國家組織（OPEC）所定的價格。這樣的，東歐進口的穀物也面臨漲價的命運，在這些食品方面，蘇聯變成一個不可靠的供應者。參見Machala, *op. cit.*, p.241。

⑥ Malcolm Mackintosh, *The Evolution of The Warsaw Pact*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delphi Papers, No. 58, June 1969), p. 1.

⑦ *Ibid.*

這種協商的形式，與史達林死後的蘇聯對東歐政策，是相互吻合的。大體言之，除了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六八年正式退出「華約組織」外，蘇聯的對外政策，在華約組織中多數獲得東歐國家支持。<sup>⑤2</sup>舉例而言，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論著中，曾列舉「華約組織」「政治協商委員會」在一九六五年、六六年、六八年、七〇年、七二年的歷次會議中，對美國之侵略越南表示譴責，並聲稱支持越南人民及中南半島其他國家的愛國勢力。<sup>⑤3</sup>

對於蘇聯而言，「華約組織」的最大貢獻是幫助蘇聯維護國防及控制東歐共黨政權。史達林死後，由於核武器、武器投射系統，以及地面部隊迅速運動等各種發展，使蘇聯重新修正其國防政策及需求。但只要蘇聯關切歐洲政治舞臺的活動，則蘇聯的新軍事思想即需要蘇聯與東歐的兵力，在蘇聯西界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緩衝地區部署，來防衛蘇聯西疆。蘇聯也需要這些兵力來維持東歐共黨統治，以及在戰爭情況下，迅速西進摧毀北約組織的兵力及地點。為了提高東歐兵力對蘇聯的價值，蘇聯必須透過「華約組織」體系，重新組織與裝備東歐盟軍，並在蘇聯指導下，協調盟軍的行動及訓練。<sup>⑤4</sup>由於「華約組織」對蘇聯的重要價值，在「聯合指揮部」及各種軍事演習與軍事計劃的擬議過程中，勢必取得支配地位。<sup>⑤5</sup>因此，「我們很難發現『華約組織』有其本身的防衛政策，由於蘇聯在華約軍事聯合部隊中所佔的比率，超過其他成員兵力的總合，此組織的軍事意義，遂陷入蘇聯本身國防政策的範圍之內。」<sup>⑤6</sup>

「華約組織」的成立，使蘇聯戰後在東歐的駐軍，獲致「合法化」的解釋。蘇聯目前在東歐的駐軍，主要包括以波蘭列格尼加（Legnica）為指揮部的北方兵團（Northern Group），以匈牙利圖庫爾（Tököl）為指揮部的南方兵團（Southern Group），以捷克米羅維斯（Milovice）為指揮部的中部兵團（Central Group），以及靠近東柏林，以朱森一烏生多夫（Zossen-Winsdorf）為指揮部的蘇聯東德兵團（The Group of Soviet Forces in [East] Germany）。<sup>⑤7</sup>這些蘇聯部隊表面上擔任華約的防衛任務，實際上他們也是蘇聯駐在當地的「警察」，用來對付東歐的「反叛」，以及未經克里姆林宮核可的任何政策改變。

針對東歐國家對匈牙利事件與捷克事件的憂懼，蘇聯目前一方面強調華約在抵抗「帝國主義攻擊」（指北約）時發揮的功能

<sup>⑤2</sup> 捷克事件雖令羅馬尼亞不滿，但羅國始終為華約之一員。

<sup>⑤3</sup> Popov, *op. cit.*, p. 84.

<sup>⑤4</sup> Mackintosh, *op. cit.*, p. 2.

<sup>⑤5</sup> 華約組織的總指揮官向俄人擔任，其他華約海、陸、空軍及空防單位，皆有蘇聯指揮官。

<sup>⑤6</sup> Jamgotch, *op. cit.*, p. 62.

<sup>⑤7</sup> Staar, *op. cit.*, p. 145.

，同時亦強調華約組織是一個提供社會主義政治商與合作的工具。⑩

## 五 結 論

無論東歐的自主趨向如何，它們與蘇聯是以共同的共黨意識形態為基礎。蘇聯與東歐皆確信「一黨精英制」(Single-Party Elitism)，相信私產公有及所有主要生產形式的公開管理，相信嚴密控制他們的社會發展。蘇聯與東歐皆贊同和平共存是促進共產主義全球性轉換的最佳工具。這種轉換，對共黨而言，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意義。⑪

蘇聯在東歐的駐軍固然限制了當地共黨政權的行動自由，但西歐集體影響力的擴大，引起了東歐國家領袖的注意，他們將視蘇聯為一抵銷的勢力。東歐最感關切的是德國可能統一及對其過去東面領土的要求。除非德國問題永久解決，否則東歐將視蘇聯為重要的同盟及現狀的保持者。⑫

總之，蘇聯與東歐之間的關係，分別存有整合與分裂的因素，故雙方未來仍將處於「談判」狀態，在「談判」過程中，我們要引述駐在東歐的一名西方外交官的話，來形容蘇聯在其中所居的地位。他說：「不要因為西方日增的影響力而產生誤解，蘇聯仍為共黨集團的模範與否可置疑的領袖。布里茲涅夫之所以放鬆繩繩，是因為他覺得，以蘇聯遠程利益而論，這樣所得的結果，總比『鐵拳統治』要好一些。」⑬

⑩ Lebedev, *op. cit.*, p. 39.

⑪ Anderson, *op. cit.*, p. 203.

⑫ *Ibid.*

⑬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22, 1973, p. 56.